

兒童青少年是什麼哲學

——我該對兒童憤怒抑或兒童該對我憤怒

畢世響

[摘要] 兒童青少年是具有魔鬼和上帝二重性的人，兒童青少年可愛極了——只要你不是他的父母或者老師，你要是他的父母或者老師，兒童青少年噁心極了。兒童青少年在根本上是一個哲學，一個思想，是人類的精魂。然而，在人類歷史和人類意識中，一直沒有隆起一個明晰的、獨立的兒童青少年觀念，他們一直依附于成人，同時陷落著成人。傳統農耕文明用結婚霸佔他們的身體，終結他們的青春，現代工業文明用上學陷落他們的青春。

[關鍵字] 兒童青少年 哲學 魔鬼 上帝

引言：我們能夠觸摸到兒童青少年嗎

有這樣一個少年：他是一條既想浮在水面上的魚，又想沉在水底的魚；他是一隻既想飛在天空的鳥，又想落在樹枝上的鳥；他是一匹既想在草原上奔騰的馬，又想在馬廄終老的馬；他是一隻既想在山中奔跑的梅花鹿，又想在綠草地休眠的梅花鹿；他是一條既想咬人的瘋狗，又想為人看家的馴狗；……總之，他既想是一個人，又想不是一個人。他既厭惡世俗，他又隨俗。他既專心致志地要做隱士，又堅定如風鳥般足不點地地向社會款款走來。霍爾頓是一個線條一般的人——幾何學上的線條沒有空間，沒有面積，霍爾頓既不想佔有空間，也不想佔有面積，他既想佔有空間，又想佔有面積，一個人一定佔有空間，佔有面積。這是美國作家傑羅姆·大衛·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1919年~2010年）的小說《麥田裏的守望者》的主角，十六歲的中學生霍爾頓·考菲爾德（Holden Caulfield）。《麥田裏的守望者》已經成為理解青少年的典

範文本，惜乎此書自從問世到當下，一直被世界誤讀，總把霍爾頓看作少年中的異類，反英雄形象，和受社會的戕害孩子。實際上，每個人都曾經是、正在是和即將是霍爾頓。真正理解霍爾頓只能用青春與氣質，他是一個有氣質內涵的典型的青春少年，他的青春和氣質在時代中的碰撞，就是他的作為，只能這樣理解社會和時代，他周圍的人不好也不壞——任何時代的人都是時代性的不好不壞。青春是人生最燦爛的，也是人生最稀爛的，青春是魔鬼和上帝都抵擋不住的誘惑，青春少年既是魔鬼氣質，又是上帝氣質。

這個時代，兒童青少年還可稱赤子嗎？父母和兒童青少年子女之間的理解頗為茫然。中國社會正在經歷從農耕文明向工業文明的過渡初期，父母和兒童青少年子女隔著兩個文明之間的冰河對峙著，又期望對話。社會的意義回到了人生的原始欲求：生存。現實的生存須彌山一般沉重，除了生存庶幾了無它意。父母對兒童青少年的感受恰是雪萊的《沮喪》：“沒有內在的平靜，沒有外在的安寧。”兒童青少年大約覺得父母是他們人生以外的意義，父母仿佛他們的作業和課外興趣。兒童青少年、父母和社會之間如何濟潤焦枯呢？

兒童青少年：遠古走來的蒼涼的畸零人

兒童青少年是什麼哲學？無以命之。這既是哲學玄思，又是生活實在，更是人類問題。兒童青少年已經成為時代大難題，人人都從兒童青少年過來，現代教育體系的核心是兒童青少年，卻難說人類的教育是清白的，因為一直沒有祭起兒童青少年的旗幟。我忝為人師，忝為人父，忝列教育學教授之門，生在平民能夠接受教育的年代，承受教育的福祉到教育學博士。教育隆我身份，供我養家活口，許我榮耀，我享受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人生快樂，也罹受著教育的苦難。我覺得天底下最刻薄的事情，莫過於教育。誰說他（她）有本事，我就看他（她）能不能把一個孩子教育出

來，能不能把一個民族的氣質改變一下，其他功勞都是末事。沒有火車、輪船、汽車、飛機、電話、電腦，我們能活，多少個年輪沒有那些破爛玩意兒，不見得活得沒有滋味，沒有富於韻味的童年和少年，人類就沒有活過。不被教育折磨過的老師，沒有活過。這不是我獨弦哀歌，而是天籟之音。我的家鄉有一句話：人還不是過得孩子的日子嗎？那是說，成年人是為孩子而活著的。這樣的教育學道理，甚為豔麗，頗發吾覆。

在人類的文明中，兒童青少年從來就不是人，一直是拿來利用、拿來設計、拿來玩弄的玩意兒。大概，因為，兒童青少年是一個依附人格，可以拿來當玩具玩耍，當風景欣賞，當工具利用，當未來的人培養。沒有一個場域是兒童青少年自己的場域，他們總是捆綁在成人的場域上，總是以一個依附關係出現，不會以一個光杆兒出現。看見一個兒童青少年，總會說他（她）是誰家的孩子。雖然所有的人歸根結底都不會以一個光杆子出現，都是以一個依附關係出現，每個人的家庭和社會身份都是他的依附關係。沒有爹娘的孫悟空，也得有一個師父唐三藏，沒有唐三藏他終歸只能是妖仙，不能成佛。“兒童青少年”是一個限制觀念，我們到底在哪個場域理解兒童青少年：他們是家庭的人兒，家庭就設計著他們，他們是學校的人兒，學校就設計著他們，他們是國家的人兒，國家就設計著他們，他們是社會的人兒，社會就設計著他們，……。兒童青少年一旦掙脫了成年人的場域，也就埋葬了“兒童青少年”，輪到他們去設計作為他們晚輩的兒童青少年。人類就這樣輪回著。

大致說來，在古代，兒童青少年被政治家利用——國家政治家和家族政治家。中國古代是長老社會，兒童青少年從來就不屬於國家，屬於家族，家族長老既是家族政治家，也是社會政治家，道德和法律是通過家族實施的；人類文明的另外一個源頭古希臘，則把人作為公共的，兒童青少年屬於國家，不屬於家族，儘管家族在一個人的身份和社會地位上有很大的作用。柏拉圖甚至設想，所有生下來的小孩都要在他們父

母認出他們前帶走，集合在一起培養。這樣，所有的孩子都不知道自己的生父生母，會將那些達到父母年齡的人都稱為父母，同儕也互相認作兄弟姐妹。因為，古希臘的個人是爲了城邦而存在，兒童青少年是未來的城邦公民。其中的極端是斯巴達，“斯巴達兒童從小就屬於國家，其教養由國家統一管理。嬰兒初生，必須經過國家人員（長老會的長老）的檢驗，把身體健壯的留下來，衰弱和畸形的拋棄掉。兒童在 7 歲以前，居家由父母教育，但須受國家監督。隨時注意保健和鍛煉身體，7 歲起，男孩均被送到國家兵營式的教育機關（一種公共兒童宿舍）去受教育，一直到 18 歲爲止。兒童和青少年在公共教育機關裏的生活是極其艱苦的：嚴冬只穿單衣，赤足行走，用石塊做枕頭，睡在蘆葦墊上，飲食極其粗劣。爲了培養兒童的堅韌性，常對他們施行殘酷的毆打，並且不許呼喊痛苦。夜間常進行捕殺奴隸的‘實習’，叫做‘秘密的服務’。”^[1]

總的來說，兒童青少年在中國是家族榮耀的承擔者，在西方是國家的後備軍人。當代社會，官員利用兒童青少年成爲政客，教師利用兒童青少年成爲教育家，寫文章的人利用兒童青少年成爲作家，做生意的人利用兒童青少年成爲富人。兒童青少年既成爲政客和教育家的權利欲望工具，更成爲工商社會的利潤算計物，青少年的實質是被工商文化消費著。教育，電影，電視，網路，流行音樂，體育運動，社會運動，小說，文藝作品，時尚，都張著血淋淋的大口，吞噬著兒童青少年的身體和靈魂，通過兒童青少年的消費，算計著他們的父母和家庭。現代社會是溺心滅質去性的社會，兒童青少年的概念益發沉淪了。

結婚：青少年盡入吾彀中矣

兒童青少年是什麼哲學觀念？主要在於兒童青少年依靠什麼立世。人類的文明史，沒有把兒童青少年當作“還不中用”的幼稚對待，沒有把他們當作“已經中用”

的成熟對待，沒有把他們當作“還不中用”和“已經中用”的中間人對待：當兒童青少年還擔當不了事情的時候，便覺得他們“不中用”，不能為家庭和自己操心的時候，也埋怨他們“不中用”；他們能夠擔當事情的時候，便覺得他們“中用”了，也能為家庭和自己操心的時候，覺得“中用”了。兒童青少年，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年齡概念，然而，“中用”或者“不中用”，在時代上的年齡尺度既明白，又糊塗。舊中國 14、15 歲的男女少年就可以結婚了，17、18 歲結婚，已經很普遍，結婚總應該是“中用”的道理吧。而貧窮人家的子弟，不到 10 歲就為家庭勞作，也“中用”了。富裕人家的兒郎，20 歲了，已經結婚，生了自己的孩子，還有傭人伺候著，叫“少爺”、“小姐”、“少奶奶”，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為祖先傳宗接代，堪稱最大功勞，難道還不是“中用”麼？這個時代，絕大多數兒童都可以過“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日子，父母輪回為他們的傭人，卻不再是少爺、小姐和少奶奶了。

大致說來，在舊時代，兒童青少年“中用”、“不中用”，即是不是“小孩子”，一是有沒有結婚，二是有沒有事情影占他們的身體。當代中國社會，農村父母本能地用“結婚”這個古老的智慧解終結孩子：使兒女結婚，那就是把父母身上的擔子卸掉，父母和兒女從一個世界裏的親人變為兩個世界裏的陌生人。城市父母同樣也用這個古老的陰謀卸卻累贅。你一結婚就是人了，應該滾出父母的護翼，父母可以名正言順地把你掃地出門。結婚是一個道德標準，還是一個人生陷阱呢，不管哪個時代，都可以用“結婚”把兒童青少年結束掉。結婚既是家庭的私事，青少年的私事，更是社會的公事。結婚是文明社會的天性，本身用不著刻意教育；影占身體卻不是家庭和兒童青少年的私事，家庭沒有能力給孩子安排事情，意味著家庭不能白白養活他們，社會不給青少年安排事情，意味著社會不能白白養活他們，那麼，就沒有事情能夠把他們霸佔住，所以，兒童青少年就一直處於一個不明不白的地位。

教育：兒童青少年盡入吾彀中矣

時代進化到教育普及歲月，兒童青少年算是有了社會政治制度化的影占身體的活兒：上學。然而，上學使兒童青少年的歸屬反而更加詭異了，它使兒童青少年哲學進入混亂的範疇。農耕文明用“結婚”捆綁他們，工業文明用“上學”捆綁他們，“結婚”和“上學”的意思恰恰發生了顛覆：農耕文明體系下，兒童青少年上學是個人和家庭的事情，國家不管，結婚卻是家族的權利，由不得自己，必須結婚，必須生孩子。在根本的意義上說，結婚和結婚的青年男女沒有多少干係，結婚是為地下和地上的祖先盡責任，接續香火。叫你結婚你就得結婚，反正男女總得結婚，而且你也不是願意結婚嗎？義務教育年代，兒童青少年上學是國家的政治制度，不是個人的事情，由不得自己。結婚卻是自己的權利，由不得父母和家族。可以 30 歲結婚，可以 40 歲結婚，結婚可以不生孩子。可以不結婚。

上學這個活兒把兒童青少年捆綁在一個全社會都知道的標準上，這樣，兒童青少年才開始有了一個明白的歸宿名義——它只是一個歸宿名義而已。義務教育是和工業文明捆綁在一起的，社會進入工業文明時代，才可能實行義務教育。這意味著進入工業文明以來，兒童青少年才有了一個社會人的名義——學生。在這個時代，說起一個十幾歲的孩子，你一定會把他（她）當作在學校上學的學生：“兒童青少年”和“學校學生”是一個概念。這個社會誤解造成社會對兒童青少年的遺棄，它只把兒童青少年扔在學校，放棄了政府的許多責任，學校只是兒童青少年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在舊中國，只有極少數兒童青少年是在學校上學的學生，窮人家十幾歲的孩子去學校上學，絕大多數人會覺得詫異，甚至認為不應該：他不在家裏出力幫助父母過日子，怎麼能去上學呢？窮人家的女孩子去上學，那就更“不應該”了：女孩子上什麼學

呢？父母怎麼在她身上花錢呢？將來還不是人家的人？這樣的現實和念頭，在這個時代，仍然很有生命力。

社會把兒童青少年拴在學校，據說是爲了給他們接受教育，而教育的道理，甚爲曖昧。我國學校教育中，沒有真正的哲學指導思想，是裸教，是教學技巧，是考試技巧，不是教育思想的熏習。教育哲學作爲一門課程，幾十年不在位，1980 年代以後，教育哲學才作爲教育系的專業課程逐漸開設出來。師範院校非教育系的學生，所開設的教育學課程，是教育學、心理學和學科教學法，一周也只有兩三節孤零零的課程，連基本概念也不知道，在學生的心目中，實在屬於蕭索的把戲。在 1950 年代中期，還開設中外教育史，後來把中外教育史撤銷掉了。當下的課程改革，把教育學又鼓搗成了教學手冊，教育理論再次被閹割掉了。所謂的教育專家以其昏昏，何以能使人昭昭？中國的教師，很難說他懂得教育。

這個時代的孩子都被圈養在學校裏了，這和工業文明下大規模圈養家禽家畜的道理是一樣的，用飼料和光線按時餵養，象吹氣泡一樣把動物催大。中國社會傳統的農耕生活方式，帶有遊牧生活方式的意思，家禽家畜能夠放養的就放養，不能放養，主要是不能叫家禽家畜，跑到莊稼地裏和蔬菜地裏，啃壞、拱壞、啄壞莊稼、蔬菜和樹木，或者牆壁。還怕家禽家畜走失，壘上牛圈，豬圈，羊圈，雞窩，鴨窩。養育孩子的道理，和養家禽家畜的道理差不多，或者，養家禽家畜的道理，和養育孩子的道理差不多，都是以放養爲要。農耕文明養育孩子的方式，是放養式，工業文明養育孩子的方式，是圈養式。

這是一個文化和精神的乾渴癆時代，社會上有那麼多的文化人與知識人，學者，教授，作家，藝術家多得就象夏天的蚊子，可是，沒有人能夠寫出一部值得兒童青少年讀的書，一篇值得讀的文章。那麼多的電影導演和電影演員，拍攝不出一部值得看

的電影。兒童青少年也只能淪落為形形色色商人的算計物了。

青少年：反叛或生存

如果在歷史上的哪個階段，湧現出青年的獨立運動，意味著反叛。說起青年人的反叛，我們往往會想起美國和法國的青年運動：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出現的篤信自由主義理念的“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又譯為“疲憊的一代”），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抗習俗和當時政治的“嬉皮士”（Hippie 或 Hippie），1970年代的思想解放和反主流的“龐克”（Punk 又譯為“朋克”），1968年法國的反對舊有秩序、改變了法國的“五月風暴”狂飆。那些青年運動的“青年”，很多是成年人了，因為青少年的概念發生了時代性的革命。從那些發生在幾個國家，卻刻畫了人類的青年學生運動來理解青少年，就知道青少年實在是人類的精靈。那些運動作為一種影響社會的精神，到現在還一直在“作怪”，如“後嬉皮士”到“後龐克”，它們對兒童青少年的風蝕，比時代的任何教育都入骨，實際上，那些運動本身已經成為一種教育運動和教育精神。那些青年運動的原因多是非經濟因素，許多青年出身于衣食無憂的中產階級家庭，更說明青年運動的意思在於精神。

雖然不能把中國社會今天所謂的“新新人類”、“非主流”和“憤青”，與西方的“嬉皮士”一類的青少年相提並論，他們確實是不同於父輩和祖輩的一代“新人類”。他們一出生就享受著人類文明社會的新工具——手機、電腦等資訊社會的科學智慧，他們的父輩出生時，享受的人類文明的工具和他們的祖輩是一樣的，所以，他們和父輩之間的差異，遠遠大於他們的父輩和他們的祖輩之間的差異。那麼，這個時代的教育就存在著一個先天的不親近：兒童青少年和父輩以及祖輩之間不能親切地對話，他們不能理解祖輩過去的生活，也不想理解，他們覺得那和他們沒有關係；另一方面，他們出生于文明轉型的初期，已經不能象父輩和祖輩那樣依靠土地，紮根一般

窮困而安穩地生活在一個固定的地方，他們要漂泊地生活，似乎生活紮不下根。他們躬逢教育普及的歲月，教育卻異化為庸俗的生存意義——教育只是為了一個飯碗。父輩和祖輩“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高尚教育觀念，已成昨日黃花，他們的教育中沒有偉岸，只有為自己明天吃飯的春困。

教育不普及的歲月，家庭需要孩子及早地擔待起生活，十幾歲的孩子已經是孩子的爹娘，算成年人了。時代越發展，青少年的年限越寬，教育普及歲月，幼稚園念書的是孩子，小學念書的是孩子，中學念書的是孩子，大學念書的是孩子，他們都是不能站立起來的兒童青少年，因為他們都不能擔待起生活，都要依靠家庭養活。一個 20 多歲、30 歲的人最終出了學校才算不是青少年了，才能擔待起生活。所以，這意味著教育使人越活越小，而不是越活越大。在這個時代，定義更是描述性的，不是傳統的本質主義的。要問“什麼是兒童青少年”，只有說出“什麼樣的人不是兒童青少年”，才能知道“什麼樣的人是兒童青少年”。

參考文獻：

[1] 羅炳之. 外國教育史(上)[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第2版）.15-16.

《教育文化論壇》2011 年第 1 期

道德教育的形而上

——道統、道德、教育之精神哲學

畢世響 教授

福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

[摘要] 道統是中國教育的根本道德精神，也是教育的形而上，它支撐著中國社會的精神世界。傳統道統在於“一貫思想”和“道之傳承”，近代以來的道統則在於社會演義。道統從過去“人適應社會”、“人則天”的典範演義為近代以來“社會改造人”、“人改造社會”、“天則人”的典範。古代傳統的仁義道德精神和西方的民主觀念成為道統的內涵，也是教育的規定性，“人民”是近代以來積澱出來的道統，教育在根本上是人民教育，這也是教育的根本道德。近代以來，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改造的關係，這個改造是教育實踐，本質是啓蒙與救亡運動，知識份子的民眾情懷則是其根本道德精神。

[關鍵字] 道統；道德；道德精神；教育精神；道德教育；人民

道統：從君與師到人與民

中國社會過去已經充分地享受了教育精神，那是以社會道統為根本的精神，教育精神概括起來就是《尚書·泰誓》所謂“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中國人最崇尚道統，離經叛道被目為異類，教育在於守成精神——守住道統。中國的教育精神一直都是社會精神，歷史精神，文化精神，道德精神，絕不是當下學校教育所玩弄的考試升學的意思。中國教育的原型是道德教育，並不在教育以外再租賃一個道德或者道德教育。當特別說道德教育的時候，大概有兩個意思，一是強調教育的道德精神，另外，要麼是教育自身把它的道德精神擱置了起來，要麼是道德精神被人為地擱置起來了，教育的道德精神並沒有丟失，只相當於教育的道德精神違和，不便出來議事。君王臨朝不臨朝，臣民都要過日子，人們忽然發現，沒有君王的聒噪，耳根子也清淨。只是時間長了，倒有些六神無主的煩躁，漸次像白天沒有太陽、夜晚沒有月亮星星一樣的末日惶恐^①。原來，不可一日無此君。

過去所理解的道統意識，大體有三個方面的涵義：1，上承夏商周三代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中啓孔子、孟子、子思，下達宋明道學家（即理學家）朱熹、張載、二程、陸九淵、周敦頤、邵雍、王陽明的儒家“聖學”思想；2，儒家自孔子以來的一貫思想。3，概指道之傳承的泛稱。每個學派皆有其道統思想，演義成全社會共同的道德精神以後，成爲社會道統，所以，道統不必拘泥于一家一派。如後來演義的儒家思想，既雜糅了先秦諸子，又雜糅了外來的佛家，宋明理學家就是以佛家爲心法的；民國形成的新儒家，汲取了西方的某些社會概念，先秦儒家思想以人爲核心，沒有多少社會結構的思想。被稱爲“最後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終身致力於社會改造，以社會結構爲建設，隆起了以教育精神爲貫穿的“鄉村建設運動”。把鄉村建設爲學校的意思——村校和鄉校，學者容易聯想到《左傳》“子產不毀鄉校”——學校精神在於教化社會和議政，地方長老爲道德領袖，鄉人聚會議事於學校。可以把梁先生的“鄉村建設運動”理解爲新儒家“社會改造人”的思想，那是對傳統儒家“人適應社會”思想的現代演義。新儒家和民國其他知識份子，在時代精神上完成了道統的歷史轉型——從傳統形而上的“道”，流轉爲世間的“人”。民國的教育運動以社會改造人與人改造社會，新中國的教育以運動強化著這個精神。

由一家之學，演義爲全社會之共同道德精神，使道統周流宇宙，包荒八極，大化流通，貫通歷史，支撐著民族的精神世界。如果說，過去的道統著重于“一貫思想”和“道之傳承”，莊子所謂“指窮於爲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1]以後和當下的道統，是隨著社會變遷而演義的精神體系，既在於社會演義，又在於吸納異文化，進行自身化和本土化的改造。近代道統的演義，是圍繞著“人”進行的各種運動，人，既有中國傳統的涵義，又有西方涵義，形成了以“民主”爲核心的“人民”觀念。中國的“人”與“民”是複合概念，楊伯峻先生結合《論語》對“人”與“民”有精當

的辯證：

孔子說仁就是“愛人”。後代，尤其現代，有些人說“人”不包括“民”。“民”是奴隸，“人”是士以上的人物。“人”和“民”二字，有時有區別，有時沒有區別。以《論語》而論，“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人”和“民”對言，就有區別。“逸民”的“民”，便不是奴隸，因為孔子所舉的伯夷、叔齊、柳下惠等都是上層人物，甚至是大奴隸主，“人”和“民”便沒有區別。縱然在孔子心目中，“士”以下的庶民是不足道的，“民斯為下矣”，但他對於“修己以安百姓”、“博施於民而能濟眾”的人，簡直捧得比堯和舜還高。從這裏又可以看到，孔子的重視人的性命，也包括一切階級、階層的人在內。^[2]

楊先生對孔子“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譯文與注釋：

【譯文】孔子說：“治理具有一千輛兵車的國家，就要嚴肅認真地對待工作，信實無欺，節約費用，愛護官吏，役使老百姓要在農閒時間。”

【注釋】愛人——古代“人”字有廣狹兩義。廣義的“人”指一切人群，狹義的人只指士大夫以上各階層的人。這裏和“民”（使“民”以時）對言，用的是狹義。^[3]

可以把民主理解為人類的道統。西方民主觀念來自于遙遠東方古希臘，經過歐洲思想家，特別是法國啓蒙運動思想家如盧梭等人的演義，積澱出具有人類典範意義的法國大革命，頒佈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即《人權宣言》），確立了“主權在民”的民主思想；中國本沒有“民主”觀念，是“民本”思想，《尚書·五子之歌》謂“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晏陽初先生的教育思想，就是基於此），《孟子·盡心章》亦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中國的民主思想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和西方民主思想的混合實踐過程。“democracy”，即“德先生”，這個詞很難翻譯，中國沒有對等的詞語或意思，民國知識份子用“民粹主義”、“平民

主義”、“庶民主義”、“民本主義”和“民主主義”來理解，“民”，被意會為“平民”或者“勞工”，“勞農”，“勞動者”，“做工的人”，那是與知識份子多少有些對立的社會階級。“人民”一直是一個模糊的觀念，“不論使用‘平民主義’還是‘庶民主義’作為‘democracy’的中譯，當時很多知識份子是把‘人民’理解為‘下層民眾’，即窮人、勞工階級、勞工、勞農等等。這樣的定義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沒有什麼關係，只是反映出知識份子對受壓迫的多數民眾的民粹主義式的道德同情。”^[4]從而形成近代以來的兩個道德精神體系：一、社會的精英即知識份子（知識精英），與社會的脊梁即民眾（人民），二、知識份子與民眾打成一片。另外，形成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道德體系，那是“勞工專政”和“勞農專政”的民主體系。在新中國的道德體系中，“人民”是絕對觀念，在毛澤東去世以後的三十年，人民逐漸成爲一個淪落的觀念。

道統，從“道”流轉爲“人”，說明“道”依“人”而流轉，從“人”流轉爲“人民”，說明道依時代精神而流轉，“人民”是近代百年社會積澱出來的道德精神。當下，似乎“人民”又逆轉爲抽象的“人”，人民已蒙塵，教育中沒有了多少人民精神。與之相表裏的是，當社會生活有些氣色的時候，當知識份子再一次狂野的時候，脊梁遭遇到精英的背叛，社會遭遇到知識份子的墮落。知識份子與民眾的不同就在於知識份子以道統自任，春秋責備賢者，知識份子的榮耀也在於此。當下的知識精英喋喋不休地叫嚷著民國知識份子的崇高地位，卻回避民國知識份子的人民情懷，誤讀民國知識份子的道德和智慧。不僅如此，當下知識份子以西方文化的吹捧者與宣傳者爲榮耀，骨子裏仍然是全盤西化的暗昧，既不懂西方文化，更不懂中國文化，是在玩弄“文化”——在根本上是玩弄自己，種下了知識份子將來被社會玩弄的禍根。

實際上，被後人無限抬高的五四和民國文化人或者知識份子，並沒有幾個能夠稱

得起思想家，思想家都在中國的歷史上。他們要麼宣傳了西方的某種民主思想而成名，要麼研究了中國歷史上的某個思想家而成名，最終形成的都是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雜交文化。致使到今天我們都不知道到底是民主，什麼是科學，什麼是自由，也許，他們一開始就沒有根本弄清楚“德先生”“賽先生”和“費小姐”的時代意義和本土化意義，生吞活剝加剛復自用就是他們對待文化的伎倆。當我們批判 1960 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到五四運動的當天，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每一天？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行爲，和文化大革命火燒、打砸行爲有什麼不一樣？當時梁漱溟先生就批評大學生火燒趙家樓的行爲是不合法的行爲，遺憾的是梁漱溟先生的理性認識今天仍然被當作反動來批判，我們到現在都沒有形成理性的愛國主義觀念，而是偏激的、沒有知識支撐的愛國主義神話。那種以非理性的批判爲開端的啓蒙運動，積澱出了文化大革命的瘋狂的批判與否定——幾乎否定了歷史上所有的人物與思想，被接受的思想家也要經過改造，才能成爲時代的“利用人物”。到現在，我們都不能心平氣和地接受一個古代中國思想家，一說到中國的思想家，總要給他來個剃陰陽頭式的所謂的“一分爲二”。那些暴得大名的人兒如嚴復、章太炎、王國維、康有爲、梁啓超、蔡元培、胡適之諸先生是值得歷史尊敬的人中龍鳳，看待他們，應該像陳寅恪先生爲王國維所撰《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所言：“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曆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精神，自由思想，才是五四和民國的道統，另外一個就是他們身上最寶貴的社會情懷、民族情懷、文化情懷，以社會道統自認的精神。

當代知識份子，在學養上絕對不可能與五四知識份子和民國知識份子相提並論，既沒有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基，亦沒有西方文化的素養，所以，在學術上不可能整體地

接續五四和民國香火，唯有那社會情懷、民族情懷、文化情懷和人民情懷才能使自己不辜負知識份子的身份。

近代社會的道統精神：傳統教化與世界潮流互參之教育運動

道統近代以來納入了兩個道德精神，一是古代以教化為道德的教育精神，一是以近代世界潮流為道德的教育精神，這兩者的互參就是中國近代以來的教育實踐。古代教育精神是以傳統的仁、義、禮、智、信、勇為德性的道德實踐，近代教育精神則是以民主、科學與自由為德性的道德運動。近代教育精神又分為兩個道德體系，一是民國道德體系，一是中國共產黨道德體系，中國共產黨的道德體系，既實踐于建國前，又實踐于建國後。

民國的道德精神集中實踐是“四維八德”，即“禮、義、廉、恥”和“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四維”，都是傳統道德的時代精神。“八德”是孫中山先生對中國傳統道德精神的時代發展，他在《民族主義》中說：“窮本溯源，我們現在要恢復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舊道德先恢復起來。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後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圖恢復。講到中國的固有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記的。首先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但是現在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舊道德。不知道我們固有的東西，如果是好的，當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放棄。此刻中國正是新舊潮流相衝突的時候，一般國民都無所適從。……所以中國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是駕乎外國人；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的民族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我們要將來能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

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5]

“四維”出於《管子·牧民》：“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廟，恭祖舊。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荒，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障兩原則刑乃繁。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逾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民國 23 年，國民政府發動新生活運動，八德與四維並為兩大主題。民國 28 年，中華民國教育部定“禮義廉恥”為全國各校共同校訓，並明示禮為“規規矩矩的態度”，義為“正正當當的行爲”，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別”，恥是“切切實實的覺悟”。抗戰時期，又另解釋為：“禮是嚴嚴整整的紀律，義是慷慨慷慨的犧牲，廉是實實在在的節約，恥是轟轟烈烈的奮鬥。”

歷史是巧合的，同樣在民國 23 年，毛澤東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報告中，明確提出蘇維埃文化教育的總方針是：“在於以共產主義的精神來教育廣大的勞苦民眾，在於使文化教育為革命戰爭與階級鬥爭服務，在於使教育與勞動聯繫起來，在於使廣大中國民眾都成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6]民國 29 年，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提出解放區的教育，即為一般平民所有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科學的、人民大眾的新教育。建國後，1957 年，毛澤東在《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

的問題》中指出：“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中共中央、國務院於 1958 年《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了“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教育精神，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共同綱領》第 41 條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文化教育為新民主主義的，即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教育。”^[7]一是“教育與生產相結合，教育與群眾相結合”。一言以蔽之，是“人民教育”，這是馬克思主義人的全面發展思想在中國教育的具體實踐。

總之，中國三十年前的教育，是以教化為精神的道德教育，旨在改造中國人和中國社會的道德精神，以社會教育為核心，學校教育只是社會教育的入門。毛澤東時代的教育運動和教育精神，“是毛澤東對民國教育思想的繼承與發展。民國教育的體系可以這樣概括：社會建設——以鄉村建設為根本的國家建設；民族再造——以公民為人的形態的人的建設；文化復興——以民主、科學與自由為核心的新文化與思想的建設；喚醒民眾——以啓蒙運動為教育精神的各種社會教育，形成與人民（勞工）打成一片的新道德；教育救國——以教育為情結的普遍的救國和建國精神。毛澤東將民國教育精神形成了新中國獨特的政治精神和社會精神，以一次一次的社會運動為形式，以鮮血與生命為代價，竭力形成了黨文化和黨道德。所以，毛澤東的一切作為都可以看成一種教育精神的實踐，‘政（治）教（育）合一’是教育的根本性質，今天的政府意識形態中，仍然滲透著這樣的思想，人的形態則是從自然人鑄造成政治人。”^[8]

當下教育觀念：對知識的忠誠

改革開放以後的三十年，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卻沒有積澱出一個完整的、穩定的教育觀念。一，教育只是學校升學考試就業的勾當，學生是學校圍牆裏面

的人，將來出了學校圍牆，也不過是進入另外一個個人生存的圍牆而已。學校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很吊詭，一是學校和社會隔離，二是學校自成社會，自我稱王，儼然一級衙門，俯視社會，家庭因為孩子的緣故有求於學校。學校完全喪失了傳統教化民成俗的道德責任，學校的世故化、庸俗化、霸王化倒是這個時代教育的脾氣，這樣，學校反成為最沒有教育精神的所在。指望這樣的學校，培養具有社會歷史責任感的人，無異於緣木求魚；二，社會不能給教育一個穩定的榮耀，因為社會不能從文化形態和文明形態的高度把握教育精神。把教育和就業捆綁在一起，使教育失去了它的精神，甚至失去了它存在的價值——因為人不接受教育也可以生存啊，社會上多少發達的人都不是依靠教育發達的。三，學校越多，越不知道教育在於對知識的忠誠，教育者使自己失去了社會對自己的尊重。在一些擁有重要學術身份的人身上，透著“精緻的窮酸”和“華麗的貧窮”，他們膜拜的只是教育給自己帶來的市儈利益，因為他們本身就是用市儈手段換來的利益，最終證明自己只是市儈而已。今天的教育，不能再使傳統知識份子的“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成為昨日黃花。

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在民間積澱出來的高尚的教育觀念，在三十年以後的今天，即在一代人以後，隨著就業和生存的艱澀，又蒙塵了。教育越熱鬧，越說明教育精神的異化，可以把這個時代叫做“後教育時代”，後教育時代的教育精神是世俗生活精神。三十年前，中國教育精神有兩個涵義，一是教育作為農耕文明體系下個別人的生活方式，另外一個是教育作為普遍的社會道德精神。那時，能夠接受學校教育的人，只是個別人，然而，教育精神卻是普遍的社會道德精神。當下正相反，能夠接受學校教育的人是絕大多數，而教育精神卻不是普遍的社會道德精神，教育精神只昂揚在個別人身上，和社會的個別領域。

教育的學校化，就是教育的狹隘化，從而產生一個問題：人才是學校教育培養出

來的嗎？這就能夠解釋為什麼現在沒有大師，大師都是在地獄和人世間掙扎出來的。

“最後一位儒家”梁漱溟《自學小史》說：“像我這樣，以一個中學生而後來任大學講席者，固然多半出於自學。……我們相信，任何一個人的學問成就，都是出於自學。學校教育不過給學生開一個端，使他更容易自學而已。”後來被胡適禮聘到北大的作家沈從文，沒有學歷，他以後的人能夠稱得上作家的實在沒有幾個人；梁漱溟後來又把沒有受過正規教育的熊十力介紹到北京大學接替他講授“唯識學”，熊十力轉而研究儒學，成爲“新儒學哲學的奠基人”。大師，本來就只是幾個人的勾當，這樣的人，身上有一種社會精神、歷史精神、文化精神，人類精神，這些精神能夠與他們遭遇，而他們往往和人類精神相齟齬，他們的人生都帶有淒苦的味道，梁、沈、熊諸先生以後的遭遇，就是大師的遭遇。而學校，特別是捷克教育家誇美紐斯創立班級授課制的現代學校教育體系，是和大工業工廠化生產相對應的教育體系，誇美紐斯就設想“學校是造就人的工廠”，學校等於造人的工廠了，還能夠指望有大師橫行嗎？現在的學校，是某些人影占身體的安樂窩，又是官僚機構，和精神又有什麼關係呢？

盧梭說：“一個民族的面貌完全是由它的政府的性質決定的。”人總是社會教育出來的，有什麼樣的社會，就有什麼樣的人，有什麼樣的人，就有什麼樣的社會。教育精神和社會精神互爲表裏，社會精神又是時代精神的映射。改革開放以後，社會逐漸進入新技術時代。新技術在一定程度上顛覆了過去的一些道德觀念和生活方式，如享樂和消費，既是國家的經濟發展政策，又是正常的生活方式而 1980 年代以前，消費是和生產對立的道德觀念，享樂是和勞動對立的道德觀念，即消費和享樂都是帶有一定的不道德意義的觀念，這個時代，哲學揭示出消費實際上是人再生產自己的方式。只是，過去人們在消費和享樂的觀念上不及，現在的消費和享樂的觀念則有些過，如果爲消費和享樂而消費和享樂，這樣就頗有把人降到動物境界的危險，會喪失人的

尊嚴與高尚。然而，與消費和享樂相表裏的是生存的沉重，很多人消費不起，又不得不消費，消費反而把人們的精神和軀體捲入了漩渦，消費精神似乎要成為社會的時代精神了。理性消費應該成為教育的一個內容，庸俗的消費精神是把自己當作商品的消費，導致人和自己的活動物件的分離，人不再尊重自己的活動（包括勞動）物件，只把那些物件看成一個沒有生命意義的東西，在根本上是把人自己看作一個沒有生命意義的存在。消費本來是對勞動結果的理性對待，勞動與消費是一對生命生產範疇——勞動結果用於消費，消費是人再生產的方式，從而生產出一個新的生命。消費那個再生產自己的方式，實際上就是一個人的新生——人在勞動中時時刻刻新生，這就是人的幸福的根本。而當下戀物癖式的消費，恰恰既不是對自己勞動的尊重，亦不是對生命的尊重，而是對自己的拋棄和不信任，因為惟有用那種消費才能證明自己。

這個時代的社會理解，往往不是通過閱讀深奧的典籍或者嚴肅的學術著作理解社會，而是通過戲說一般的影視和小說，模仿著商業化的下作，有意識地歪曲著歷史和文化以收嘩眾取寵之功利。學者已經喪失了基本的引導民眾的道德立場，喪失了對知識的忠貞，搖唇鼓舌地曲解典籍，欺騙民眾，公開販賣自己的知識，成為赤裸裸的鮮廉寡恥之利祿之徒，卻以“老師”自居。他們不是老師，是文化暴發戶，或者文化潑皮，既沒有前人的積澱，也沒有以後發展的後勁，缺乏對學術真正的敬畏，甚至缺乏做人的基本道理。在骨子裏不懂得知識的尊貴，也就不會真正尊重知識，尊重人，只是尊重知識給個人帶來的世俗利益，

道德教育精神與新人種

近代中國社會道統遭遇著新舊文明體系對峙和對話二重性交鋒，新文明體系是近代西方的海洋文明體系，中國社會仍然是傳統的農耕文明體系。儘管中國固有的遊牧文明體系具有海洋文明的雄闊氣質，遊牧文明卻一直是北方少數民族的生活方式，不

是中原文明體系的主調，甚至一直被中原文化排斥和貶低，它進入中原的過程和西方海洋文明進入全球一樣，都是擄掠侵入，“五胡亂華”給中原文化和人種侵入了新的基因；中國文化本來就是多元文化，先秦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後來形成的社會主流儒家文化是融通了先秦諸子和後來佛家的文化，佛家文化同樣也中國化。一般把道家看作中國文化的暗流，在精神上，道家學說具有海洋文明的浪漫與衝破，莊子的逍遙遊，鯤鵬展翅衝破宇宙，並不是庸俗所理解的“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那種有限的躍與飛，之所以“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是因為“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9]鯤鵬待風而飛，不是徹底的逍遙。莊子的思想是宇宙與人的精神共舞，人與宇宙無間，也就是中國文化中最精當的天人合一觀念。道家的天人合一是以人的精神為宇宙的精神，天為人而存在，天則人，以人心為天心；儒家的天人合一則是以宇宙的精神為人的精神，人為天而存在，人則天，以天心為人心。當代中國道統，應該把儒家的入世精神、道家的海洋氣質、少數民族的遊牧氣質和其他浪漫氣質與西洋的海洋精神共同烘托出來，這應該是中國海洋文明的神韻，教育，根本意義是誕生出新人種。

當代社會文明進入了農耕文明際遇海洋文明的敘事。農耕文明道德是內斂的，溫雅的，含蓄的，海洋文明道德是張揚的，肆意的，放縱的。西方社會近代以來實際上走的是兩條曖昧之路，一條是思想上正義的道德之路，一條是行為上掠奪的罪惡之路。西方社會正是進入現代文明以後才過上了好日子，他們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是對其他國家打算的結果。可是，中國的民主思想中沒有多少這樣的元素，我們吸收的是西方民主思想中單一的元素。西方 500 年前的地理大發現，發現地球是圓的，才知道地球的另外一極也有人燦爛著，才接近形成“人類”觀念，人類進入了全球一體化的第一個歷史斷代——海洋文明，這個斷代是和掠奪與民主觀念捆綁在一起的文明實

驗。譬如，人類學就是跟隨西方殖民者的腳步和槍炮傳播的學問，西方殖民者以高等文明人的姿態，把西方文明傳播到地球的各個角落，在中國偏僻的鄉村都有西方文化的身影，最生動的莫過於教堂和教會學校；又如，拿破崙入侵其他國家的時候，也把沉澱了啓蒙思想和大革命精神——尊重人權、自由、平等——的民法《拿破崙法典》一起侵入了其他國家，那些“國家被拿破崙征服以後，他直接或間接地在這些國家確立了新的原則，即法國革命的原則、平等的原則並摧毀封建制度。”“拿破崙兵敗的根源在於，自由和平等的大革命理念意味著一切民族壓迫行爲都失去了合法性。被占國的人民先是在拿破崙的指引下覺悟到這一點，然後在這位導師的侵略行爲背叛了革命原則時轉而反抗。”^[10]殖民地的現代化就是這麼吊詭地被殖民者啓蒙的，東方民族如中國開啓現代化是一個被動運動和外因哲學。而被動運動和外因哲學在中國本土演義成先知先覺者之主動運動和內因哲學，進一步發展爲全民族的運動，從而形成現代化的另一個道德典範——“馬列主義普遍真理與本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那是以高尚的道德感召力爲精神的運動，是教育人民、教育社會的運動。

教育是濟世情懷，中國傳統的知識份子，都會神往張載的思想：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以道統自任是知識份子的根本情懷，社會愈變化，愈突出知識份子的道統自任精神。中國知識份子對共產主義學說的接受，在中國傳統學說方面，是儒家的大同淵源，或者說，中國傳統的學說中，有和共產主義遙相呼應的大同學說。這樣的情懷，正是大乘情懷，和馬克思主義解放全人類的情懷是相通的。先進的中國知識份子，有傳統的道德精神，敢爲天下先^①，有先知知後知、先覺覺後覺^②的浩然之氣^③和大丈夫氣概^④。中國共產黨人一開始就懷抱著強烈的救世主義，投身於喚起民眾熱情的鬥爭之中。他們的教育運動，就在於喚醒民眾，改造社會。

近代以來中國的道德教育，就是這樣的精神流傳。近代以來的一切建設都以社會運動為形式，其核心是教育精神——既是先知先覺者對民眾的教育，又是先知先覺者的自我教育，也是政府對社會的教育，還是文化教育，政治教育。社會的一切活動，都是具有教育精神的活動，無論是民國的文化運動還是教育運動如平民教育、鄉村建設運動、鄉村師範等，還是建國以後的歷次運動，如社會主義教育教育、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對全社會和全國人民的教育運動，教育本身注重於其自身的道德精神，並不在教育以外再附加一個道德精神。這是中國道德教育最根本的意義，也是自古以來的教育精神——教育本身就是道德教育，荷載道德精神的教育，教育本身就是針對國家和國民的教育，而不只是針對國家的某個領域，或者某個群體的人。

參考文獻：

- [1]曹礎基.莊子淺注（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0.46.
- [2]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22.
- [3]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4.
- [4][新]顧昕·從“平民主義”到“勞農專政”：——五四激進思潮中的民粹主義和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1919-1922年）[J]·當代中國研究，1999（2）·
- [5]孫中山全集（第9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6.243-254.
- [6]毛澤東同志論教育工作[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8.
- [7]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N].人民日報，1949-9-30.
- [8]畢世響·道德與教育的祭壇意義[J]·中國德育，2009（12）·
- [9]曹礎基.莊子淺注（修訂本）[M].北京：中華書局，2000.2-3.
- [10] <http://finance.cctv.com/special/C16860/01/index.shtml>

Metaphysics of Moral Education

——Philosophy Of Mind Of Orthodoxy 、Morality and Education

Bi Shix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Educatio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Orthodoxy (Daotong) , which is the backbone of the spiritual world in Chinese society, is the fundamental moral spirit of Chinese education, also the metaphysics of education as well. The traditional orthodoxy is "the coherence of thought" and the "transmission of way (Dao)", while in modern times lies in the social historical transformation. "Adapt to society", and "man imitates heaven" was the apotheosis of orthodoxy, while in modern times it has been evolving the apotheosis of "society transforms man", " man transform the society", and "heaven imitates man". The ancient traditional spirit of virtue and morality and the Western concept of democracy has become the connotation of orthodoxy, and also the requirements of education . "The people" as the age's orthodoxy has been accumulated since modern times. Education is essentially the people's education, which is the fundamental morality in educa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human beings and society are mutually transforming. This transformation is educational practice, in essence, is the enlightenment and salvation movement, with intellectuals and the sentiment towards people as its fundamental moral spirit.

Key words: orthodoxy (Daotong) , morality , the spirit of morality , the spirit of education , moral Education , the people